

山西歷代 紀事本末

主編 侯伍杰



商務印書館

山西近代 纪事本末

——

田

山西近代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

主编 侯伍杰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侯伍杰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ISBN 7-100-02872-8

I. 山… II. 侯… III. 地方史—纪事本末体—山西
IV. 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263 号

SHĀNXĪ LÌDAI JÌSHÌ BĚNMÒ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

主 编 侯伍杰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河北省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872-8/K·61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16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0 插页 4 页

定价:132.00 元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

主 编： 侯伍杰

副主编： 薛俊华 崔凡芝
梁锦秀 杨巨平
高 可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编委会

主 编：侯伍杰

副主编：薛俊华 崔凡芝 梁锦秀

杨巨平 高 可

执行副主编：崔凡芝 梁锦秀

编 委：赵瑞民 王振芳 马玉山 王守恩

陈文秀 郭卫民 张晓芒 王毅鸣

张明亮 卢 渝 徐炳林 逯哲锋

组织策划：薛俊华 杨巨平 张晓芒

学术顾问：乔志强

通 审：程人乾

审 稿：杨国勇 刘书礼 王毅鸣

序

侯 伍 杰

我们的家乡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 and 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芮城西侯度文化表明,早在 180 万年前,我们的远祖就生息、蕃衍在这方土地上。西侯度文化以降各个时期遍布全省的文化遗存,尤其是炎黄二帝和尧、舜、禹在我省的生动传说和诸多遗址,充分反映了山西古代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地位。禹都安邑,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诞生;三家分晋,揭开了战国争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嬗变的帷幕。我省南依中原腹里,北临大漠,在长期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汇中,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壮大和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发挥了突出作用。山西表里山河,形势险固,土肥水美,物产丰盛,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人文荟萃之乡。隋末李渊父子起兵太原而开创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朝的基业;明初的山西移民从大槐树下走向全国,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清代,山西票号“汇通天下”,走向世界,执海内金融之牛耳;山西人杰地灵,历史上各个领域涌现的名贤异才如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佛学家等等如群星璀璨、代不乏人。我们的先辈素著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击外来侵略和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惊天地、泣鬼神,所创建的英雄业绩彪炳史册、不可胜数,尤其是 20 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中得到了新的升华。同时,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山西人民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富有生机和黄土气息的质朴刚健、开拓进取、融会创新的三晋文化,汇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如江河浩瀚,共日月同辉。纵览历史长卷,我们看到,曾经涌动于山西大地的历史风云,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读史以明志。今天,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应该为我们民族、我们家乡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感到由衷的骄傲和振奋。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建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放眼世纪之交的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



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香港和澳门回归洗雪了民族百年耻辱,祖国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胜利。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这样生机盎然、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团结兴旺、英姿勃勃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化正在赢得新时代的伟大复兴。我们的家乡——山西,也以祖国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崭新面貌为世人所瞩目,在兴晋富民的道路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鉴古而知今,50年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它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大步跨越、大放异彩的50年。它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雄辩地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跨世纪发展的大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党中央再次提出了加强学习任务。江泽民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战略高度,从提高民族素质和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时代要求出发,反复强调全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并以此带动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学习。他多次提到要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华民族史和近现代史。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和有针对性的。当前,我们学习历史,不仅能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总结得失,搞好工作,还能通过对民族进步和祖国变迁的纵向了解中,从中外历史演进的横向对比中,用祖先曾有的辉煌鞭策我们,树立振兴中华、兴晋富民的决心和信心;从我们取得的成就和洗雪的历史耻辱中找到正确答案,把朴素的爱国之情升华为报国之志,并落实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中。学习历史当然不应忽视对家乡历史的了解和学习,在这方面我省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为了推进兴晋富民发展战略的实施,省委提出要搞好爱党、爱国、爱山西的教育,开展了基本国情、省情教育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加强了地方历史和地方文化的研究、学习和宣传,在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扩大山西知名度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山西历代纪事本末》正是本着同样的宗旨和目的,在世纪之交为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关心山西的人士提供的一部学习历史,了解家乡,宣传山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省情教育的有益读物。

我省素有地方史研究和编纂的良好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又有编年体、纪传体和专题论著性史书多部问世。本书作为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编著的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山西地方史,在地方史著中尚属鲜见。当然,我们采用这一体裁,主要是从编书的宗旨目的出发,意在发挥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中心,宜于完整、明快地叙述历史事件的优势。在编写中,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融历史学专著的科学性、学术性与历史普及读物的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在选题上,全书上溯远古,下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采择我省范围有影响的重要事项凡249个,各自独立成篇,并以时间顺序排列,以期全面、系统、清晰地



展现山西波澜壮阔、绚丽丰满的历史画卷。参与本书编撰的是以山西大学历史系为主,联合我省多家社科研究单位的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相信本书的编撰出版,对宣传我省历史,弘扬三晋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导 言

山西历史源远流长,在创建中华文明、推进中国历史前进中,凭借其特有的地理形势,以开阔深远的思想认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做出过重大贡献,涌现出无数的杰出人物,形成了既与中华一体又具自身特色的山西区域文化。往观追溯,选取有代表性的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按纪事本末体例加以叙写,再现历史的辉煌,也反思汲取教训,用以激励后人,启迪来者,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食粮,为爱省爱国的教育提供历史素材,这是撰写本书的初衷。为此,先对山西地区的地理沿革与特征、主要历史贡献、文化特点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编写体例的具体运用,略作以下提示。

一 地理沿革与特征

山西地区的名称,刻有历史的印记,又与所处地理方位、历代政区建置密切相关。

《尚书·禹贡》载,夏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今山西处于冀州之域,当时的冀州包括今山西南部 and 相连的河北、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

殷商时,河汾以东,今山西翼城、侯马一带的方圆百里处,是尧的后裔唐国之地。西周初,唐作乱被平定,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此,称唐侯。唐侯子燮父继位迁都后,因境内有晋水流过,国号由“唐”改为“晋”。晋不断扩疆,占有今山西大部,兼及今河北、河南、陕西部分地区。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各家领土均向外扩展,占有今山西全部,并西达黄河西岸,东至今河北中部,北到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南及河南汝、颍流域,统称为三晋。

战国时,秦以咸阳为都,东出与六国争雄,以崤山或华山为界,有“山东”、“山西”之称,韩、赵、魏属山东列国。西汉末刘秀起兵,占据太行山以东,史称其“自事山东”,派大将邓禹“平定山西”,此“山东”、“山西”之称,是以太行山为界,今山西之名由此而来。又坐北朝南看,山西在太行山之右,故后有“山右”之称。

秦汉推行郡县制,在今山西地区先后建有太原、上党、河东、雁门等郡,河东郡在当时确指黄河以东今晋南地区,逐渐也以“河东”泛指今山西全省。随着地区界限日益准确,便以“山西河东”专指今山西地区,隋末李渊曾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所辖即今山西绝大部分地区。唐分全国为道,今山西地区为河东道。宋以路建制,改河东道为河东路。

元行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制,所置“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直属中书省,辖今山西全境。

明继续实行元制,置“山西行中书省”,简称“山西省”,后又改称“山西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山西布政司”。清沿袭明制,正式称“山西省”,相沿至今。

承历史称谓,今天“晋”已成山西省的正式简称,“三晋”为泛称。

山西处于北纬 $34^{\circ}36'$ 至 $44^{\circ}44'$,东经 $110^{\circ}15'$ 至 $114^{\circ}32'$ 。西邻陕西,东接河北,北为内蒙古,南为河南。东西宽约380公里,南北长约680公里,总面积约156,000平方公里,偏于我国中西部。

新生代的造山运动,使我国的地形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整体走势,山西处于中部的黄土高原东部,海拔大都在1000米以上,形成背负西北高原大山,俯瞰东南广阔平原的雄浑之势。

山西境内有东西两大高原山地区,即东部以太行山为主干,从北至南形成了恒山、五台山、系舟山、霍山、中条山系列,海拔大都在1500米以上,其中多有山间盆地,以上党盆地为最大;西部以吕梁山为主干,由北而南的芦芽山、云中山、关帝山形成系列,海拔多在2500米以上,至南渐趋平缓。全省山区面积占70%以上。

在两侧高原山系的中间,是中部由断层陷落而成的一连串盆地,由北而南有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等盆地,海拔由1000米逐渐降至250米,形成北高南低的阶梯形状。距今约10万年以后受自然风化和西北风挟带大量尘土的影响,在山地、丘陵以及大小盆地上,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层。因山泉雨水长期冲刷,黄土层切割成无数沟壑,与崇山峻岭错落有致地形成千山万壑的地形地貌,成为黄土高原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早在距今约240万年至73万年间,这里除高峻的山岭外,大部分为水面占据。以后湖泊逐渐萎缩,河道逐渐形成,无数山泉溪水汇聚成大小1000多条河流。从北至南,重要河流有桑干河、滹沱河、沁河、涑水河等等。最长者是贯穿南北的汾河,它源于芦芽山脉的管岑山,流经太原、临汾盆地,由禹门口南入黄河,为黄河第二大支流。汹涌澎湃的黄河水从山陕峡谷穿行而过,至山西西南角,拐个大弯后,浩浩荡荡向东流去。黄河和汾河都是山西人的母亲河,哺育了山西大地上的人类和无数生灵,也为山岳起伏的三晋大地,增添了激越的活力和整体的壮观。

现今山西的气候,由北而南,属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400~650毫米,年平均温度在 $4\sim 14^{\circ}\text{C}$,无霜期120~210天。但在远古,则几经冰期与间冰期的变迁,气温落差较大,波动数约 $10\sim 15^{\circ}\text{C}$,距今一万年以后,渐趋稳定。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到殷代,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今 2°C ,之后的波动数保持在 $1\sim 2^{\circ}\text{C}$,最低时低于现今 4°C 左右。晋南与晋北气候和物产均有明显的差异。



二 中华文明的摇篮

据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研究,大约距今 300 万年到 100 万年的远古洪荒时期,人类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工具,从而与动物有了本质区别,开始了人类自身的发展。

发现于山西南端芮城县西侯度村的古人类遗址,被测定距今 180 万年,属旧石器早期。当时这里气候温暖偏凉,四季分明。森林草原林木茂盛,河湖鱼类游弋,陆地栖息着成群的动物,形成完美的食物链,中国最早的人类便在此进化发展起来。从发掘出带有人工痕迹的石头和兽骨看,西侯度人已会打制石器、制造骨角器了,即已走出人猿相揖别的第一步。依据遗址出土的有烧灼痕迹的动物骸骨和牙齿看,西侯度人可能已学会用火。火使人类开始熟食,并用以防寒御兽,是人类征服自然、促进体质发展的一次飞跃,赋予了人类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这是一场革命,一块界碑,是山西地区早期先人为人类发展做出的第一大贡献。

距西侯度不远的芮城风陵渡西北 7 公里处有匭(kē 科)河遗址,距今约 70 万年,当时气温已经回升,冰期已经过去。这里的石片石器文化上承西侯度文化,下启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丁村文化。

丁村遗址在襄汾县汾河左岸,在此挖出的三枚人牙、人顶骨右上部化石,是山西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环节,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体特征。当时生态环境宜人,临汾、侯马古湖尚未消失,周围是疏林草原,气候比现今暖和并略干一些。丁村人所使用的石器形体硕大,风格粗放,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经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这种文化贯穿旧石器早、中、晚三期,几乎遍布于汾河流域,被称作汾河文化,实开山西区域文化的先河。经过向周围的辐射,这一文化也成为奠定黄河中下游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一。

距今 2.4~1.6 万年的沁水县下川遗址的先民们,正遇末次冰期的极盛期,平均气温比现今低 7℃ 左右。但这时的人类,在艰难的跋涉中,已增强了承受力,迸发出更强的创造性,他们已有了选择与创造生活条件的能力,在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山间盆地一些温暖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能栖身的石灰岩洞和岩棚,打磨出精美的细石器,进行原始的狩猎与农业种植活动。

从西侯度、匭河、丁村到下川,山西地区旧石器文化已形成自己的发展序列,体现了原始人类进化的全过程,从中得以认识人类童年时期的风貌。山西这块热土,实为探索中国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 1 万年至公元前 2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原始社会晚期。山西地区星罗棋布的人类遗址,反映着这一时期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位于襄汾县东北、距丁村文化遗



址约9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最富代表性。这里的人们已定居窑洞中。大量的磨制石器与陶器,说明狩猎与农业有了长足发展。墓葬的不同规格,显示着墓主的严格等级差别和私有制的发展程度。陪葬的铜器、皮鼓、石磬等礼器,表明礼仪制度已具有一定规模。尤其出土陶片上用毛笔朱书的字迹和少量卜骨,更可推测文字使用和宗教活动已在孕育中。此时约为公元前2200余年,相当于尧舜时代。传说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蒲州镇),平阳、蒲坂应该是陶寺所在地及其附近的晋南地区。可以说一个国家雏形已然出现,进入文明社会已是一步之遥。在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山西先民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贡献。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都城逐渐移往河南、陕西,虽然政治重心转移,但晋南地区仍在“王畿千里”之内。这里流传着许多有关的重要传说,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多有契合处。传说河津县龙门天险为大禹开凿,故称“禹门口”,芮城大禹渡建有禹王庙,纪念其治水的功劳。禹都安邑(今夏县西北)虽属传说,但经过20多年的考古挖掘,夏文化遗存几乎遍布全省,可以推断河、汾、涑、浹地区,就是文献所说的夏墟、大夏之地。夏朝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开始了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又一个新时代。

《史记·殷本纪》云:契的母亲简狄为有娥氏女,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有娥当在蒲州也。”蒲州即今永济市境的蒲州镇。近年发现的垣曲商城是商代在山西的重要军事据点。在今山西境内,还有许多有关商代的传说,虽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大量商代铜器在山西境内发现,甲骨文所记方国中不少都在山西境内,表明山西是商代统治的核心地区之一,这却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尤其80年代以后的考古证明,晋南发现的一些文化遗存,属典型的商文化,晋中以北及吕梁山、黄河一带的文化遗存,既具明显的商文化色彩,又受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影响,是有土著特点的混合文化,应是山西境内商文化的主流。

《史记·周本纪》说弃的母亲为有邰氏女,据钱穆等学者研究,有邰当在今闻喜、稷山县一带。到周文王时,从解决虞(今平陆)、芮(今芮城)争端到武力戡黎(今黎城),已占领了晋南大部分地区,正实现着从“三分天下有其二”到最终灭商的战略计划。叔虞封唐后,晋国最为周天子倚重,晋文化成为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侯马晋国遗址发掘的铸铜遗址,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已进入繁荣发达阶段,并显示出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和精细的制作工艺。侯马盟书展示了当时礼制、文字、书法及政治斗争的情况。

华夏文明从尧、舜、禹的初步形成,到夏、商、周的进一步发展,晋南地区都是根本之地。苏秉琦先生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①因此,誉之为华夏文明的摇篮,是当之无愧的。

^①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三 京师锁钥与强藩割据

夏、商、周以后,中国所有大一统朝代的国都,大都在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黄河、海河流域。山西地区以其靠近京师的地理方位和优越的山河形势,担当着拱卫京师的重要职责,晋国则首开其例。

晋国从周初受封后,经过一系列改革调整,由百里小国逐渐强盛起来,到西周末终成辅弼周室的大国。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晋文侯联合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于第二年保护平王东迁洛邑,开创了东周政权。随后,晋文侯又杀掉非正统的携王,结束周王室长达 10 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树立了晋国为周天子股肱的形象。前 635 年周王室内乱,晋文公出兵勤王,护送周襄王回洛邑复位。前 632 年,晋文公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东)一战打败楚国,遏制了楚向中原的发展,晋国获得尊王攘夷的美名,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其后又有景公争霸、悼公复霸等,其霸业长达 150 多年,终春秋之世,晋国始终是周天子的坚强护卫。

进入战国,无论是独步中原达百年之久的魏国,还是一直抵御强秦的赵国,抑或已被秦国蚕食得所剩无几的韩国,对不绝如缕、孱弱到极点的周天子,依然尊其为天下共主,始终表示臣服。这也许实质上是一种地方政权力量不足以取代天子之位时,采取自我保护的最好方法,而这一作法也为后世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兴起于三晋的法家,剔除分封制中的宗法形式,把地方服从护卫中央的思想,融入兴起并成熟于三晋地区的郡县制度之中,成为国家大法。三晋由之强盛,移植于秦,得以统一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在三晋旧地设置的郡县,在防御匈奴、镇压旧贵族叛乱中维护了新建的中央政权,从此奠定了山西在集权政体下成为地方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在随后的汉、唐、宋、元、明、清统一政权下,始终起着抵御外患、消弭内乱、屏障京师的重要作用。这些政权,除派驻重兵,设置相应机构外,还往往在山西北部依险要地势加筑长城和军事关隘。例如,汉武帝曾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以防匈奴寇边。后在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时,成为出兵的通路和军事基地,记录了汉代征讨匈奴的赫赫战功。又如明初建九边重镇,将大同镇、山西镇附近的偏关、宁武、雁门、平型等重要关隘与长城相连,成为有效抵御元裔势力的军事防线。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晋阳古城从春秋末年建立之日起,便成为历代的军事重镇,阻击过无数的外来侵犯。唐大规模修建晋阳城,定其为北都,不仅因其为王业所兴之地而示以尊崇,更重要的是其作为边境重镇需升格对待。果然在安史之乱中,唐大将李光弼据以击退史思明 10 万大军的围攻,并收复河南、河北大片失地。之后唐室衰微,河北、山东为割据势力所占,晋阳城仍能与长安呼应,维系唐王朝的统治。只是到朱温控制河中后,才截



断太原的支援,夺取了长安。就此看,顺晋阳南下,临汾、河中等地均为关中都城的锁钥。即使后来的政权多在河南、河北建都,但山西“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的地理形势与位置,仍为拱卫京师的屏障。

除此之外,山西物产丰富、财货殷实、民风强悍、勇于奉献等等,亦是成为国家坚强支柱的重要原因。清代疆域北移,山西的战略地位有所降低,但山西发达的手工业,尤其是冶铸业,为清军提供了必备的兵器;富甲天下的晋商提供巨额的经费,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清政权平叛安边的实施。

在国家强大统一时,山西地区能起京都锁钥、军事重镇的作用;在中央政权衰微、天下分裂割据时,山西又会因其表里山河、易守难攻、存储丰厚的条件,成为地方势力称王称霸的重要策源地,对京都造成直接威胁。春秋战国时的晋与三晋,虽然口头上对天子称臣,实质上是占据一方,向外扩展,已启强藩割据的先河。楚汉相争时,赵、魏诸侯忙于收复旧地,实属割据遗风再现,故有韩信的平魏取赵。十六国南北朝时,山西更是分裂战乱的首发地,刘渊建汉后直攻长安灭西晋,揭开了纷争序幕。其后割据势力以山西为依托,陆续向外出击,以定都平城的北魏势力最强大,最后统一北方。五代时,中原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其中间三个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进行割据后,才南下定都于洛阳、开封的,实际上是山西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往往以山西割据势力取胜告终。

其后又有宋初李筠凭借太原孤军反宋,明初元裔势力王保保割据晋阳等等。近现代阎锡山军阀政权建有相对独立的工矿、银行、交通企事业等,推行“村本政治”,形成国内拥有实力的地方势力,形势有利便出击,不利便固守。就此看,山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又使割据者占尽了可攻可守的优势。

四 民族交汇的洪炉

在中国历史上,营农耕生活的华夏族,与营游牧渔猎生活的其他民族,原来是错居杂处的,但在长期的相互交往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华夏族,主要占据适宜农耕的中原地区;而未融入华夏族的其他民族,则从中原退往四方。古代山西大致分成两大经济类型区,南部多以农耕为主;北部多以游牧为主,民族分界也大致如此,因而山西在民族融合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周初,古唐地处戎狄环绕之中,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地时,为其定下“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即在政治上沿袭夏王朝的先进制度,在生活习俗上又照顾戎狄的传统习惯。晋国基本上执行了这一方针,虽然也不免时有战争,但更主要的是互相通婚、贸易、会盟、信任的交好关系。春秋时魏绛的“和戎”,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成为治国、改



革的重要方略。在民族融合中,晋国由弹丸小国发展成霸主大国,三晋的领地扩展到黄河以西、以南,太行山以东,雁门关以北,都城也纷纷迁到河南、河北。这样强劲的发展势头,显然与民族融合所焕发的旺盛生命力有直接关系,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结果。

秦汉以后,地接祖国北部边地,南通中原腹地的山西地区,成为新的民族融合地与民族交往的通道。接连不断兴起于北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往中原地区的文明富庶与适宜的生存环境,在向内迁徙定居中,与汉族政权不断发生碰撞,形成长期民族纷争。山西民众备受骚扰,英勇抗击侵扰已成优秀传统。但同时,战争过后,又能较好地处理民族关系,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和他们建立的政权。如东汉末,政府在汾河流域的汾阳、祁县、隰县、忻州、文水等地,分别安置匈奴5个部族15万人内迁定居。西晋时,4批定居于晋北、晋中的匈奴部族竟达19种35万人。拓跋鲜卑建都平城,史称北魏。北魏全方位推进以汉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改革,终于战胜群雄,结束十六国的分割局面,其代表人物冯太后与孝文帝亦以成就大业载入史册。此前已有匈奴刘氏建立的汉和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等政权,亦是依据山西地区活动的。造成“五胡十六国”局面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主体少数民族中,山西就占了三个。许多山西人参与支持了这些政权,使山西再一次成为民族融合的基地,为隋唐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多民族国家的再建做出贡献。

五代十国以及宋辽金元时期,先后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内徙建立政权,山西同样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地区。此时的民族融合已进入较深层次,表现有二:其一,少数民族政权上层汉化较深,有较高的政治与文化修养,能有效地组织所辖地区的经济生产与文化教育活动,取得了同汉政权相对趋同的社会治理效果。如果说五代十国时活跃于山西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还以征战为主的话,辽金元在山西的活动,便主要体现在长期的经济文化治理上了。辽治西京大同地区长达180余年,所建大同古城、华严寺大殿、应县木塔等,构造精巧,气象宏伟,是我国古建筑的瑰宝,其雕刻、绘画、刻印经书,均为我国灿烂文明的组成部分。金治山西全境达130余年,平阳成为雕版印刷中心,赵城《金藏》是国家今存的一部珍贵佛经。元治山西168年,除农业、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外,文学、史学、戏剧有长足发展。受少数民族慷慨高歌习俗的影响,山西地区成为元杂剧创作与演出的摇篮。就以上情况看,我国各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已进入有高度文明的发展阶段。

其二,自觉的中华一体观念已然形成。这一阶段的政权多为蕃汉合作体制,汉族的上层和知识分子在政权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少数民族的上层已转变为封建官僚地主,这些政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与生产生活方式,与汉族政权已别无二致。少数民族的民众在征战与谋生中,逐渐离开了原来的聚居地,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加速了阶级分化,阶级关系的结合代替了民族结合,原有的民族形式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族逐渐在观念上有了中华一体的祖国观念。他们逐鹿中原,涉足华夏,打的是华夷同祖的旗号,用的是炎黄子孙的身份,宣扬的是胡汉一家的理论。例如,契丹族建

立的辽政权,自视承接中华传统,所用货币多为唐钱、宋钱,建筑、绘画、雕塑也继承了唐代风格。他们与日本、波斯、大食等东西方国家交往中,从来以中国自居,故至今国内外一些民族语言中,仍把中国称作“契丹”。这种中华一体的观念,实际在山西境内早就形成了,故元代、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治理山西,比之其他地区阻隔要少一些,而山西的文化、民风、生活方式中,也更多地反映出一些少数民族的影响,这种中华一体的认同,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期民族交融中形成的。

五 开拓创新思想与爱国传统

大山环绕,难免使人有封闭保守的倾向,但在古代的山西,走出大山,寻求发展,则是这里人们思维趋向的主流。在与其他区域和民族的交往中,造就了山西人容纳百川的胸怀和不分畛域的气度,形成了在兼收并蓄中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早在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时期,形成于晋南地区,以玫瑰花图案为特征的庙底沟文化,便以极大的辐射力影响着晋、陕、豫广大地区,这应是山西先民开拓精神的最早体现。其后,活跃于晋南地区的夏、商、周先人,亦陆续走出大山,跨过黄河,在新的环境里各自成就了一番宏伟事业。以后晋国争霸,三晋称雄,十六国与五代逐鹿中原,李渊太原起兵终建大唐,以及现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山西都是重要的根据地,说明这是一方积蓄力量、成就大业的基地。

从古至今,山西在思想文化以及经济活动方面,曾有过卓越的成就,都体现了开拓创新的思想风貌。三晋是法家的摇篮。战国初期的李悝为魏国人,吴起、商鞅虽为卫人,但都曾仕于魏国,形成了变法思想。李悝在魏国变法,使魏独步中原近百年;吴起先参加魏国改革,后到楚国变法,使楚得以强盛;商鞅从魏到秦,大刀阔斧的变法给秦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战国后期的李斯、韩非将成熟的法治思想移植秦国,使秦国得以统一天下,而李斯、韩非是赵国著名儒法兼备的理论家荀况的学生。荀况曾先后到齐、秦、赵、楚等国讲学,在继承前期法家、兼取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将儒家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适合封建一统政治的治国理论,后经韩非的进一步集大成,李斯的成功实践,成为封建社会中治国理论的重要部分,至今,其严于执法的精神,还是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的。北魏孝文帝、冯太后义无反顾的改革精神,更是开拓创新精神的典范。

三晋也是纵横家产生和最活跃的地区,司马迁就说过“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① 他们的特点是能够适应客观需要,随时调整政策方略,其实质与法家不墨守常规、因时善变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魏人张仪、犀首是其代表。

^① 《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304 页。